

我與農村發展組

2009年1月22日上午，經鄧力群女兒羅小韻安排，原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成員孫方明拜訪93歲高齡的鄧力群，請老人回憶當年支持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的有關情況。採訪時，由陽光傳媒作了錄像，翟志琳、李享錄音。採訪時，羅小韻及鄧力群處的服務人員在座。本文根據錄音由翟志琳整理，未經本人審閱。

孫方明：中國改革搞了30年了，最早是從農村開始改革。改革之初當時有一個組叫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是在您的支持下搞起來的。

鄧力群：對。

孫方明：最早是一幫年輕人一起搞農村改革和農村發展的研究，您做了很多方面的支持。這個組是在你支持下開始對農村改革和農村發展搞了很多研究。想請鄧老對當時怎麼支持這個組，回憶一下當時的情況。

鄧力群：我記得的事情是這樣，怎麼樣開始籌建這個組，這就要說到鄧英淘那個時候在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的教育。原來的地點在山西，後來他到了河南。當時是在駐馬店有個農業勞模叫崔慶美，他辦了一個半耕半讀的學校，叫「程莊農業勞動大學」，吸收了一些當地的青年，也吸收了一些下鄉接受貧下中農教育的青年。

我記得這個學校和辦校人得到了周總理的關懷和鼓勵。這麼一個點就成了當時在好幾個地方下鄉青年關注的地方，來來

往往到那裡採訪，到那裡參加勞動，參加活動。英淘也就是這樣從山西到了這個地方。英淘認識了陳一諮，是在山西，大約是在1971年。這個人是北大畢業的，多次到農村做調查，多次在農村交朋友，這樣就和英淘認識了。在這個同時我記得還有一個劉大明。這個時間大概是1974~1975年那個期間。1973年，我剛剛解除了隔離，經過英淘介紹，陳一諮到石家莊紅旗幹校看望我，主要是聽他說農村的情況。

我記得一些細節，1976年周總理去世，天安門廣大的青年包括各個方面的幹部，都在天安門廣場用各種形式悼念總理。送花圈，送花籃，用紙質的絹花挽了道牆，都完全變白了。在這個時候，英淘也回到北京，參加了弔唁，也寫了幾首弔唁總理的詩詞，經常到那裡去。

羅小韻那時候比英淘回來得早。當時的政策是一家有兩個以上下鄉知識青年的可以先回來一個，小韻是先回來的一個，回來在襪子廠當女工。因為我有一個萊卡照相機，我喜歡照相，大概可能有點遺傳的關係，她看到了這部照相機，也拿了這部照相機學著照相。其中有一張照片還得到了獎勵，就是天安門悼念活動中間，有個青年演說懷念周總理，她把這個場景照下來了，然後就印發了給一部分她所熟悉的朋友。後來不知道在什麼範圍之內就流傳，並且被提名授獎。

英淘回來北京，回家休息，剛才說了在悼念周總理的同時我就讓他讀書，讀了《資本論》三卷，讀了《剩餘價值學說史》三卷。有一兩個月在家裡他多次談起陳一諮，這個人是在農村做調查的時間很長，在農村裡面結交的朋友不少。這樣就因此引起了我想再見見這個人。1974年我回到北京之後，他多次到家中看望我。因為我一直對農村的事情很關注。是和他商量的還是我提出來的，我說讓他回到北京，在社科院農經所裡面作為一個點，通過交往一個一個地把在農村接受教育的人，願意以後還為農村工作的人，一個一個地吸收起來。

經過我和胡耀邦商量，胡耀邦那個時候是中組部的部長。我說農村有陳一諮這樣一個人在農村進行活動，對農村的情況

比較瞭解，也結交了一批朋友，我想把他調回北京來，他本人也願意回來，這樣胡耀邦就同意了。陳一諮回到北京後，就安排在農經所。就慢慢地把他認識的人一個一個地吸收，這個時候已經到了1979年了。

1977年年底鄧小平已經恢復工作了。1977年5月，我和王震到他那裡見了他。鄧小平說汪東興和李鑫來看我，轉述華國鋒的意見，希望他能重新回來工作，管軍事，管外交，鄧小平當時就和他們說他還想管教育，管科技。我和王震去的時候是5月份，汪東興他們是3月份，從那裡就瞭解到了鄧已經很快就能出來工作了。

出來工作以後那是1977年的秋天，他組織了一個會，聽高教部的彙報，當時高校還停止招生，學生也都下鄉，接受貧下中農的教育了。與這個同時，按照毛主席的意見，大學裡面開始接受工農兵進大學，當大學生。

那時候清華大學招收的工農兵大學生已經辦了幾期了，但考試入校已經廢止多年了。到了1977年的冬天，可能是11月吧，鄧主持會議，我也參加了會議，高教部的人彙報情況，就提起說要恢復高考，每年暑假以往的經驗辦法，每年恢復大學的入學高考。吸收中學生或夠相當水平的學生參加考試，合格的就錄取，還照以往的辦法一年一年地把高等教育恢復起來，繼續辦下去。

他們說1978年夏天才能開始，我當時就插了一句話，我說下鄉的青年很多，有的文化水平也比較高，是不是不要等明年夏天，今年秋天就開始考一次，鄧小平馬上接受了。這樣就和以往不一樣，第一次冬季招收下鄉青年參加考試。

那時候英洵到京悼念周總理，讀書也都讀完了，恰好在他們那個地區有（考試）分場。這次招考學生不是都到北京來，而是分別到各個地方，反正河南南部有一個考場，鄧英洵就參加了考試，考中了北大。這樣就第一次對北大來講有了一批冬季入學的下鄉青年大學生。

英洵當時是26歲，比他歲數大的還有30多歲的。他在幾

所學校裡結識了一些從農村回來的青年，其中有些人也還有這樣的志願，說在大學讀了以後還想繼續為農村、農民服務。其中有一個人我還記得很清楚，是北大的青年教師，叫何維凌，與陳一諮認識，也願意研究農村問題。同時慢慢吸收的人也就越來越多了。好像到了1979、1980年，已經有十幾個人了，就成立了一個農村發展調查工作小組，陳一諮當組長，鄧英洵和何維凌也是成員之一，不同的是他們還是必須上學，有關的活動他們參加，多數時間他們還是上學。後來人就一個一個的多了。杜鷹是從雲南下鄉青年回來參加的一個，還有一個王小強參加了，還有一個曉燕，那是在《工人日報》當記者的一個女孩子，她父親是高教部的幹部，也參加到這個組的活動。在這以前英洵在農村就認識了吳曉燕，吳曉燕也還認識一些人，就介紹一些人到這個組裡面來。

這個組人越來越多，照管這個組的找了一個叫王耕今的老同志，一直搞農村工作，對農村情況熟悉，對農村工作有經驗，當時是農經所的副所長。好像當時是給了他一個責任就讓他管理這個組。這個人的作風也很好，和其它人的關係也很好。這樣有了這個組以後，就不斷地到一些地方，其中也到當時全國很有名的一些堅持合作經濟的單位做調查，華西大隊、七里營公社。北京附近的，名字我忘記了。河南就有好幾個，南邊也有，河北省、北京也有，石家莊附近也有。這個組有些時候到這些單位去做調查，收集材料，整理材料。這些材料經過我那裡。那時候已經到了1981年，已經有了中央辦公廳的研究室，是我主管的，把這些材料送到有關的單位和負責人。

這裡就要先回過頭來說，1977年鄧小平恢復工作以後，特別關注農村工作。原來他出來工作是要萬里管鐵路，那時候鐵路堵塞，造反派搗亂，一個一個地霸佔，造反派把這個壟斷起來，不准列車通行，最厲害的一個大同不讓列車把煤運出來。河南的鄭州、信陽都有這樣的情況，甘肅天水也有這樣的情況。鄧小平讓他（萬里）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時間把造反派所造成的鐵路堵塞、貨運不通的情況改變過來了。

我記得讓萬里當了一陣鐵道部長。在這個同時，因為對農村問題鄧小平高度關注，就讓他去安徽當省委書記，代替李葆華——李大釗的兒子，原來當省委書記。當初的意圖也是想把曾希聖造成的嚴重農村困難情況，讓李葆華去當書記，把曾希聖調出來，讓李葆華去，當了一陣子效果不明顯。不知道是誰提意見，鄧小平就讓萬里不當鐵道部長，到安徽去當省委書記，這是一個重大的轉變。

萬里到安徽以後，時間不長，就發現了鳳陽縣小崗村，農民自己包產到戶。萬里去做了調查，認為很好，提倡贊成支持。確實實行包產到戶以後農業生產迅速地恢復，農村生活明顯地改善，農業生產工具不斷改進，農民的牛、羊、馬也在增長，生活逐年改善，萬里就很支持。回到省委，省委有不同意見。結果就形成萬里作為省委書記支持一個小崗村搞包產到戶，其它人沒有同意。可是小崗的經驗影響了周圍的公社，甚至於也影響了附近的縣。

萬里去安徽當書記是鄧讓他去的。萬里去安徽以後的這些情況，農村發展組瞭解得很清楚，就回來向我彙報，我把這些情況向鄧小平、向陳雲同志彙報。我記得在這之後不久萬里回北京見到了陳雲同志，向陳雲同志說他支持小崗農民，搞包產到戶，情況轉變得很好，很快。陳雲同志說我雙手贊成。

在這個期間宋平是甘肅的省委書記，我們是老朋友，他每次來北京開會都要到我那裡聊聊天。我那時候是辦公廳的副主任，下面有個研究室，中共中央辦公廳研究室。說到農村的情況，我就和他介紹說萬里在農村試驗支持有這樣一個辦法。他聽了以後很高興，回去以後就省委做了一個決定，在甘肅東部高原地區，即三西地區，那個地方雨水很少，農民飲水，耕地用水都要挖很深很深的井。在合作化期間，大家一窩蜂不願意精耕細作，所以每年收穫的糧食都不夠吃，怎麼辦，那裡的農民到了秋收完了以後就到外面逃荒，等到春耕的時候再回來。宋平和省委決定在三個專屬高原地區試行包產到戶，第一年就明顯見效。包產到戶以後農民集中精力耕種自己的地，或者

是小組的地。結果當年糧食就增產，當年就和往年不一樣，農民不逃荒了。本來宋平和省委決定是在這「三西」實行包產到戶，其它地區還不實行，並且這個決定不公開不發表，只是省委通過了。可是新華社的記者列席了這個會，他們沒請示省委同意就把這個消息傳佈出去了。傳佈出去以後平原地區有的公社，有的大隊，有的生產隊自己也就實行包產到戶。我記得甘肅去新疆的路旁邊有幾個隊聯合起來實行包產到戶，其它的事情組織集體的公社，發展特別的明顯。養牲口的公社，養羊的公社，根據當地有資源的公社生產發展得很快。

我記得小韻還專門到這些地區做過採訪，而且把這些地區的成績照相回來。這些事情農村發展組都收集了材料，提供給我們的辦公室，我們的研究室也就把這些材料分送了常委，還有秘書長。胡耀邦是秘書長，姚依林是第一副秘書長，胡喬木是第二副秘書長，姚依林兼辦公廳主任，鄧力群是辦公廳的副主任。剛才說了，在我下面搞了一個辦公廳的研究室，以後把原來的政治研究室合併起來成立了中央書記處研究室。

這個時候，國內和一些省就流傳著很多說法，鄧出來工作以前，農村的困難雖然有所轉變，但還沒有完全好轉。四川流傳一種「要吃糧，找紫陽」；安徽流傳「要吃米，找萬里」。要吃糧是什麼意思呢？趙紫陽去四川當省委書記以前，李井泉把公糧收集起來以後，保存積累了很多公糧。因為四川是產糧大省，公糧收集起來以後運出來有困難，而四川的農民缺糧，趙紫陽就低價出售，結果幾年的功夫，把李井泉積累下來的糧食都幾乎售光了。可是在產糧低的地區，或者糧食困難的地區，有了這個糧就度過了困難了。因此有了「要吃糧，找紫陽」，「要吃米，找萬里」，這就是指萬里支持小崗農民搞包產到戶，在安徽造成的影響。

支持小崗農民，周圍的隊、周圍的縣都仿照辦，但成績最好，接受最快的就是肥西縣。肥西縣的縣委書記、縣長，縣委的一班人意見完全一致，都願意按照小崗的辦法搞包產到戶，因此在全縣範圍裡面搞包產到戶，一兩年功夫，效果很好。當

時安徽省參事郭崇毅把他們全縣實行包產到戶的情況整理了一個材料，送到北京。後來找到了發展組的陳一諮，他把這個材料複印了給我，我把這個材料原文搞成一個白頭參閱件，印了十幾份，有一份給鄧，鄧看了在全縣的範圍內實行包產到戶，非常地高興。看了這個材料後鄧小平在下面他批了幾句話，我記不準原話了，大體上是這個意思：這樣的包產到戶不會削弱集體經濟，反而有助於集體經濟的鞏固和發展。

這個作為文字的東西經過農村發展組，而且是一個縣範圍裡實行包產到戶的效果上報了中央，上報了常委，得到了鄧小平和陳雲同志的支持。因此，發展組到全國收集有關、調查有關各個地方的類似的或者比這搞得更好的農村的新的經驗、新的情況，陸陸續續地收集材料，發展組的人也就越來越多了，名字我記不清楚了，孫方明是一個，杜鷹算一個，還有些什麼人我記不準了。

一直到了1981年，這個時候趙紫陽已經從四川調回到北京當國務院總理，當了不久，發展組就把當時在安徽省及全國調查到的一些整理了一份綜合報告，好像他們所瞭解的全國各地實行包產到戶的成績、效果，一份比較完整的材料送到我手裡，我就把這個材料也送給趙紫陽，趙紫陽看了以後，說這份材料對包產到戶講得很清楚、很全面，看來全國也只能這樣辦了，也應該這樣辦了。這樣包產到戶就得到了國務院的支持，而且作為全國都要實行的方針了。

這就在全國範圍內推廣出去了。推廣的過程中我還很清楚地記得兩個出乎意料的反映：一個貴州省委書記池必卿，在貴州推廣包產到戶，推廣中間進行試點，問農民是不是在這個同時要分田到戶。出乎意料，出乎省委書記的意料，農民不贊成分田到戶，堅持只搞包產到戶。這個情況反映到我們這裡來，我們也想像不到，這是第一個反映。第二個反映是在晉西北，五台山附近，也是1981年推廣包產到戶，問農民是不是也同時實行分田到戶，這裡的農民和貴州的農民一樣也拒絕分田到戶，很奇怪，很有意思。這樣也沒有經過中央通電，也沒

有新華社發消息，全國到處在推廣包產到戶的時候通通拒絕了分田到戶，保持了土地公有。這個中央沒有想到，我們做這個工作的人也沒有想到這一點。

到了1981、1982年，在全國實行包產到戶的同時通通拒絕了分田到戶。在這期間，我記得發展組的人越來越多，效果剛才講地從一個小崗村做到一個縣，然後宋平在甘肅推廣，以後就是剛才說的肥西，還有1981年以後全國實行。到了這個時候差不多同一個時期就發現了農村階級分化，有的農民貧困，包產到戶以後不夠吃，要賣工；有的農民家庭或者人口多，或者條件好，就不但能夠種自己的地，而且把別人的地收來一起種，這樣農村發生分化的問題就同時出現了，開始比較少，後來就越來越多地出現了農村雇工的問題。那時候是書記處研究室經濟組，在一些農村調查了，那是1982年了。

我們研究室有三個組，一個經濟組，經濟組裡有王玉清，老革命，還有一個主任叫梅行。他們和發展組一樣經常到農村做調查。到了這個時候就在陝西發現了一些村子已經有雇工，有的農民賣工，有的農戶雇工，而且在別的地方也發現了。最明顯的就是在廣東。廣東有經濟作物，經濟作物季節性強，勞動要有一定的技術，好比養魚，好比種果樹等等，需要有技術。沒有技術魚養不好，果樹也養不好，這樣有些人就需要有點資金、有些人就沒有資金沒有條件自己養魚，就出去賣工。

他們一直做全國性的調查。這些情況反映到書記處研究室，也反映到書記處。我主張更系統地，更大的範圍裡進行調查雇工的情況，胡耀邦就害怕了，認為這一調查就給人一種印象，上級不贊成雇工，對雇工的發展不利，我們兩個人之間發生了爭論。在常委內部也產生了不同意見，小平同志主張允許雇工，不但農村允許，城市也允許。

在我們研究室內部做調查有的贊成，也有人反對。一部分人發現有雇工，認為這是不可避免的，表示贊成；也有少數人說這樣會產生階級分化，走回頭路，就反對雇工。這個情況反映到陳雲同志那裡。陳雲同志說：在黨內的一個一個問題上有

不同意見的爭論是黨興旺發達的標誌，是好現象，如果黨裡面什麼事情出來以後大家都鴉雀無聲，那我們黨就處於危機的狀態了。也是在這個時候，開始搞了每年的第一號文件，主要是農業的。1982年初，第一個中央一號文件對雇工的問題有兩句話是按照陳雲同志的意見寫的：允許雇工，不要登報。

以後連續五年第一號文件都是關於農村問題的。而這個文件的起草，內容可以說是幾個方面合作，一個書記處研究室，一個當時的農委和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一個農村發展組。

到1985年夏季，農村發展組的人就開始分散了。有的到了國務院農村發展中心，有的到了國務院體改委，有的留在了社科院。陳一諮帶了幾個人到了趙紫陽那裡，趙紫陽給了他一個體改研究所，當所長。

到了這個時候發展組就不存在了，這個組的主體到了國務院農村發展中心，在那裡建立了一個發展研究所，英洵、杜鷹、周其仁、羅小朋、陳錫文等骨幹都到了這個研究所，這個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長王岐山。1988年夏季，英洵回到了社科院，擔任農村發展研究所的副所長。去國務院發展中心的陳錫文，工作還不錯，得到了王夢奎的提拔，成為發展中心的副主任。何維凌後來到美國和墨西哥講學，汽車失事，在公路上被撞死了。杜鷹留在了農村發展中心，後來又到了農業部和發改委，一直從事農業問題的研究。

一句話，農村發展組對於農村這30年改革開放中間的調查研究、收集材料、提供意見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貢獻。